



当代世界经济

主 编 郑必坚
副主编 张伯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教材

当代世界经济

主 编 郑必坚
副主编 张伯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世界经济/郑必坚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6

ISBN 7 - 5035 - 2718 - 8

I. 当… II. 郑… III. 经济 - 概况 - 世界
IV. F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7893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 dxcbs. net](http://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河燕华装订厂装订

2003 年 6 月第 2 版 2004 年 12 月第 4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印张: 11.875

字数: 308 千字 印数: 24001—30000 册

定价: 21.00 元

责任编辑 司 边
封面设计 翟永莲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巧艳 马丽蕊
责任印制 宋二顺

中共中央党校

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名单

顾问：郑必坚 龚育之 刘海藩
 杨春贵

主任：虞云耀

副主任：王伟光 李君如 石泰峰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卢先福	孙庆聚	李兴山
李书磊	李良栋	李忠杰
李援朝	严书翰	张伯里
庞元正	赵 曜	赵伯英
贾高建	郭德宏	黄士安
康绍邦		

中共中央党校

“五当代”教材编委会委员名单

主 任：郑必坚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伟光	叶小文	邢贵思
杨春贵	李君如	李德洙
肖 扬	张万年	周光召
龚育之		

“三基本”、“五当代”教材引言*

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即“三基本”）和《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法制》、《当代世界军事和中国国防》、《当代世界思潮》（即“五当代”），作为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系列教材，经过3年多的试用和修订，现在陆续正式出版了。

这个系列教材，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后开始编写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郑重写进党章。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地位作了系统阐述，同时强调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现在这个系列教材，就是以这些思想作为指针来编写的，并从一开始就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的重视和支持。他在对中央党校校委会1998年工作要点所作的批示中指出：“关于‘三个基本’、‘五个当代’教材的编写，是一件大事，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务必加强领导，组织精兵强将，包括吸收校外专家参加，加强协作，一定要拿出高水平的成果。”

从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发表“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到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

* 此引言写于2001年12月“三基本”教材出版之际。

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形成了进入新世纪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其间在2000年6月，中共中央还通过了《关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提出了进入新世纪党校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随即召开了全国党校工作会议。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明确指出了党的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思想政治素质，这就是：一要有坚强的党性，二要有宽广的视野，三要有务实的战略思维能力，四是归根到底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显然，这是根据进入新世纪党的事业发展的全局要求提出来的，实质上也正是“三个代表”要求在于部教育问题上的集中体现。此后到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进一步强调指出：党校、行政学院和各种干部教育机构，都要“按照提高理论素养、树立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加强党性修养、增强解决问题能力的要求，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培训质量，培养良好作风”。应当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进入21世纪党的干部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已经十分明确和完备。

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干部教育，包括党校教育，就绝不应当是孤立的和静止的，更不应当是经院式的，而必须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必须是与时俱进的，因而必须把理论学习同实践、科学和时代的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对世界、中国以及党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研究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际上，中央党校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教学改革的新布局，这个新布局以既不丢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又充分适应世界大转折和中国新发展为基本要求，以“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为基本内涵。“三基本”、“五当代”系列教材就是这个新布局的重要体现和重要成果。

根据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的决定，“三基

本”已经作为全国干部培训的教材。

在具体研读和使用“三基本”、“五当代”教材的时候，有些什么问题需要提请读者注意呢？这里着重提出以下四点，即“四个贯通”。

一、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搞好干部教育，就要下功夫面对“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深层次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贯通起来，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素养

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搞好干部教育，根本之点是加强理论基础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素养。

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是我们党的旗帜。

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夕，毛泽东就鲜明地主张我们党应是“主义的结合”，他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①。在建党之时，中国共产党人立起的旗子，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民主运动才得到更加广阔和深入的发展，北伐战争和农民运动的革命巨澜才得以蓬勃兴起，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但是历史同时说明，那时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还是很幼稚的。要真正做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完备理论，还需要经历艰难曲折的过程。从党的一大到六大，各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为实现这个结合作出过贡献，又都没有能够解决好这个历史课题。

^① 毛泽东：《致罗璋阶信》（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党的七大是真正自觉地解决了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的一次代表大会。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七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当然不是意味着抛弃或者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强调这个结合已经实现了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科学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在中国，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有了毛泽东思想确定的正确路线和方向，有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全党团结，有了愚公移山那样的精神状态，有了准备迎接困难的清醒头脑，从七大到八大，11年时间，我们党真是无往而不胜。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七大确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线^①，得到胜利、完满的实现，而且向前推进，使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党的八大为标志，我们党开始了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种新的探索取得许多重要成就，成为我们党极可宝贵的思想财富。但是，后来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曲折甚至严重失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严重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长达10年的内乱。“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党的九大和十大，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名义下，举起了“文化大革命”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它实际上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①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十二大、十三大，我们在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四大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又一次伟大革命”，并且明确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概念，系统地论述了这个理论的科学意义和主要内容，规划了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的任务。党的十五大，在邓小平逝世后的国内外形势下，作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决策，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如同七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决不是意味着抛弃或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当然也决不是意味着抛弃或贬低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科学成果，即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所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与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质上是一个意思。

历史的结论是：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旗帜，给党和人民带来伟大的胜利；举起“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旗帜，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纠正“文化大革命”实践和理论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继承、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举起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旗帜，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胜利。从党的一大到十五大的全部发展进程，鲜明地昭示出旗帜问题、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问题，对于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这里有一个“老祖宗”和“新境界”的问题。党的事业要向前发展，一方面不能丢掉“老祖宗”，一方面又要开拓“新境界”，这样才能既一脉相承，又不失时机地勇敢地打开新的局面。“老祖宗”不能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则。因为我们共产党的由来和目标，我们的世界观、历史观，我们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丢了“老祖宗”，就会丧失根本，就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同时，一定要有“新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原则。因为我们党要适应新的需要，解决新的问题，就必须形成新的理论，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新境界，就会停滞不前，也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

因此，我们今天在进入 21 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尤其需要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下苦功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二、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搞好干部教育，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对当代世界的深刻观察贯通起来，树立广大干部的世界眼光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贯通起来，还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世界的新情况、新特点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同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学说的研究借鉴、批判吸收结合起来。江泽

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① 只要看一看这一百五十多年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发展过来的，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始终是在同时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的紧密联系中不断发展的。因此，学习“三基本”，一定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

这里重点讨论一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虽然“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是最近这些年才广泛流行开来的，但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却很早就开始了。

首先请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观察人类历史上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这一百几十年间，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现象的。他们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

马克思、恩格斯的概括，何等鲜明、尖锐、透彻！完全可以说，这正是他们对人类历史上实际上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及其包含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所作出的郑重的科学判断。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由此而来。

作为以蒸汽机的使用为代表的，人类社会在18到19世纪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生产力大飞跃、科学技术大飞跃、经济社会化大飞跃总结果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政治、社会、阶级及民族、国家间多方面矛盾的激化，这一切在人类认识史上引发的最伟大的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伟大号召的《共产党宣言》。

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应运而生。

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战略道路，则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大体同时发生。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全球化进入第二轮。在以电力、内燃机、化工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新的大飞跃发展基础上，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资本帝国主义。但是资本帝国主义矛盾发展的实际结果，是在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过程中走向反面——在20世纪上半叶接连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在发展的同时，引发和激化了种种复杂的矛盾，乃至出现了逆转、中断和断裂。结果是：战争引起革命。

这也是形势逼人。

由此而“逼”出了列宁主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其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又使邻接苏联的东欧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又“逼”出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人民大革命，中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还“逼”出了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就是列宁倡导的。

列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同新的历史大变动结合起来，而他们所构想、所实践并取得伟大成功的战略道路，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完全不同。那就是利用资本主义

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在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俄国）甚至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用革命手段主要是革命战争夺取政权，并从而把国家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还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独创性道路。这一切，又都同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中断、逆转、断裂，直接相关。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也是应运而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信息革命开始，特别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这就是新一轮即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就已经开始了以电子技术为先导，以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和航天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新的工业革命。但那时信息革命还没有真正起来，可以看作是信息革命的准备阶段。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中心，形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技术群，才可以说是信息革命的开始，并由此出现了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通过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强有力地促进交通、通讯和国际金融运转的高速化发展，而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国际经济联系愈益紧密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

这里发人深省的，是三个方面的巨大变动。首先，毋庸讳言，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仍然主要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也有种种曲折，表明它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但是总的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汲取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教训和苏联社会主义前期计划经济的经验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多方面的改革调整，是得到了实际成效的。从国内的改革调整，延伸到创建和运用一整套适应和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组织，从而使得

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生产力、经济社会化和世界市场，得到长足发展。

其次，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各国，经过快速发展阶段以后，固步自封起来，停滞在“计划经济”模式上，并且陷入同美国争霸和进行军备竞赛的误区，而无视以至拒绝社会主义改革。如果说“经互会”也是一种国家间经济合作，但那实质上仍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封闭半封闭模式。而苏共和东欧诸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却又从长期停滞僵化（一个极端）跳到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个极端）。如同列宁所指出的第二国际各党的破产一样，苏共和东欧诸党未能对形势的新变动作出科学的分析，应对战略更是完全错误的。结果是，苏联、东欧一大片社会主义江山，不战而亡。

第三，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以及东欧那一大批党完全不同，我们党经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建国30年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在党和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所作可贵探索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同时也在“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错误造成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基础上，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同新的历史大变动结合起来了。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重新思考中国问题，重新思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自己起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创出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这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在改革开放中，实质上也就是在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在世界风云变幻的二十多年间，实现了我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前两步，实现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新的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所开创的这样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从未提出过、更从未实践过的战略道路。恰恰在这一点上，突出地鲜明地表现了邓小平的理论和战略的时代精神和历史创造性。

二十多年来，我们党的一切巨大成功和胜利，我们党的一切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都是由此而来的。当然，事情还有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是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我们今天的种种困惑，种种困难，种种消极现象，难道不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吗？

中国共产党的重新思考，正如邓小平所说，是形势所逼——“迫使”。我们自己的严重挫折，苏联瓦解和东欧剧变，加上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逼”出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话：“东欧、苏联的事件帮了我们，坏事变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①

可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也还是应运而生。

总之，讲当代世界发生大转折，离不开经济全球化，而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是经历了相当长久的发展进程和历史曲折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在这个地球上的产生、发展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同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有着深刻内在的联系。试看《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这一百五十多年，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共产主义者，一代又一代，应运而生，历经磨难，不断地开拓前进。由此悟出一条大道理：我们的理论、路线、指导思想，是一定要也一定能够与时俱进，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因而也就一定能够应乎天理，顺乎人情，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样看问题，这样来学习，我们就一定能够提起更浓厚的理论兴趣，掌握应有的历史高度和时代精神，并且一定能够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根据现在的情况，包括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法

^① 邓小平：会见金日成的谈话（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58页。